

被遺忘的受害者

談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影響和介入策略

沈慶鴻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於民國八十七年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告實施，條文中的第二條及第三條即明白表示「所有的家庭成員（包括未成年子女）皆為保護協助的對象」，然而至目前為止，家庭暴力防治的工作中仍以婚姻暴力中的受虐婦女為主要的研究、保護協助和討論的焦點；在有限的人力、經費和資源下，其它的家庭成員——尤其是目睹父母婚姻暴力的子女或在父母暴力衝突中亦受虐的子女，則為婚姻暴力防治計畫中最被忽略的象。

婚姻暴力的現象由來已久，直至一九七〇年代末，當婚姻暴力又再度成為實務工作者和研究人員重視的焦點後，被毆婦女所關心的兒童，以及在庇護所內這些兒童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和行為上的困境，才引起專業人員對這些目睹母親被攻擊兒童的注意；雖然直到最近，目睹家中暴力的兒童才被當成一個需要治

療和重視的議題，但是處理「目睹兒童（child

witness）」的適應問題，和預防目睹兒童成為未來暴力使用者的想法，卻成為目前所有婚姻暴力預防方案上的焦點（Peled, Jaffe & Edleson, 1995）。

過去對目睹兒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司法系統上的討論，大多數的議題係針對兒童虐待、性虐待的審判提出質疑，並思考如何在審判的過程中減低兒童可能出現的創傷，及提出法律和社會福利機構在協助目睹兒童時可以改進的地方（Goodman, 1984; Jacobson, 1991; Rabinowitz, 1985; Weissman, 1991; Whitcomb, 1985），然而，司法系統的改進固然重要，但對其他沒有進入司法系統的目光兒童而言，並未受到任何的關切和重視。

兒童目睹暴力的普遍性

由一九七五—一九八五美國全國家庭暴力調查（national family violence surveys）報告可知，每年有超過一〇〇〇萬的美國兒童目睹父母間的身體攻擊，且其中2/3的攻擊行為是持續發生的，而兒童也持續的曝露在父母的暴力行為下（Straus, 1991; Carlson (1984)的研究則發現，約有三三〇萬的兒童暴露在母親受虐的危機下（引自 Peled, Jaffe & Edleson, 1995）。另外，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1991）的犯罪資料統計，在一些都市地區，有一〇%—二〇%的殺人事件，是在兒童目睹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其中有二五%的加害人是兒童的家人；而依 Russell (1982) 針對婚姻性暴力的調查了解，一四%的已婚婦女在他們的生活會曾經歷過婚姻強暴，這些攻擊行為有十一%

是至少被家中一個兒童知道或目睹的 (Arroyo & Eth, 1995)。

和婚姻暴力普遍性的估計一樣，Straus (1991) 也認為以上的統計資料，完全是低估的結果，許多父母常因為孩子小，而毫不忌諱的在兒童面前表現暴力的行為，Straus 依婚姻暴力的普遍性和實務工作的經驗來推估，認為全美至少有 1/3 的兒童，是持續暴露在父母暴力行為下的。此外，在這些兒童目睹父母婚姻暴力的事件中，以目睹父親攻擊母親的暴力行為較多 (Peled, Jaffe & Edleson, 1995; Straus, 1991; Ulbrich & Huber, 1979)，且女童目睹暴力的機會較男童高 (Ulbrich & Huber, 1979; Webersing, Hollinger & Delamatre, 1991)。

目睹兒童的分類

在父母婚姻暴力中的目睹兒童可以分為目睹且直接受傷害的兒童和目睹但未直接受傷害的兒童兩種 (Rosenberg & Giberson, 1991)：

一、目睹且直接受傷害的兒童：兒童目睹父母婚姻暴力和兒童虐待間常有重疊的現象，

特別是在身體虐待、疏忽和性虐待上，這些兒童除了目睹父母婚姻暴力外，自己本身也是被虐待和疏忽的對象，特別是在當這些孩子想要保護他們被毆打的家人時；此外，孩子亦常成為任一方父母發洩憤怒和挫折的直接對象。

Kalmuss (1984) 在其婚姻暴力的研究中發現，許多嚴厲的暴力行為中，其實也存在著兒童虐待的事實，這些虐待的行為，包括施暴者直接對兒童的虐待，也包括被毆的妻子以兒童為發洩對象的兒童虐待 (引自 Gondolf & Fisher, 1991)。沈慶鴻 (2000a) 的研究則發現先生威脅要虐待孩子或已經對孩子的身體上造成傷害，是最常讓受虐婦女離開先生的原因之一。

二、目睹但未直接受傷害的兒童：這類的兒童雖未受到直接的身體傷害，但仍可由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了解到兒童受其父母暴力行為上的干擾，使得兒童在行為上有明顯的改變，如攻擊行為增加、退縮、做夢、源自於心理異常的身體問題 (psychosomatic) 的抱怨、學業上出現問題 (無法專注、拒絕上學、不願完成學校作業)，這些可能都與父母婚姻暴力有關，值得臨床工作人員提高警覺。

父母婚姻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

婚姻暴力直接的受害者是受虐婦女，但是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此一暴力行為的影響，尤其是兒童 (Porsstorm-Cohen & Rosenbaum, 1985)。目睹父母間的暴力攻擊行為，對兒童而言是一件高壓力的事，而此壓力也是造成許多兒童心理—社會問題的危險因子 (Straus, 1991)。

創傷後壓力異常 (PTSD) 是種診斷上的分類名稱，指個人面對威脅生命事件的經驗及心靈創傷後所出現的症候群，緊張、害怕、無助和恐懼是主要的症狀，出現 PTSD 的個人可能是此一創傷事件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整個創傷事件的眼睹者 (Arroyo & Eth, 1995)。

目睹母親處於受虐情境下的兒童，會出現一些與創傷後壓力異常 (PTSD) 相似的焦慮、憂鬱、恐懼、無助感，以及攻擊、依賴、自我虐待、低自尊、遲鈍的情緒反應，和生理上的困難、不良的睡眠習慣及不良的社交能力等內隱的行為 (Arroyo & Eth, 1995; Beckford, 1994; Gryth, Jouriles & Swank, 2000; Peled, Jaffe & Edleson, 1995; Randolph & Condie, 1993)。

Worth, Matthews & Coleman, 1990), 以及酗酒、藥物濫用、攻擊、學校等適應問題, 以及家庭外的攻擊行為和犯罪事件等外顯的攻擊行為 (Beckford, 1994; Gryth, Jouriles & Swank, 2000; Peled, Jaffe & Edleson, 1995; Straus, 1991; Tutty & Wager, 1994), 且暴露在暴力的次數愈多, 表現出心理—社會問題的可能性和嚴重度也愈高, 這些現象亦將影響到兒童的道德發展 (Arroyo & Elh, 1995; Gryth, Jouriles & Swank, 2000; Tutty & Wager, 1994)。

此外, 這些兒童不僅被暴力行為所影響, 而且還常常為了安全問題, 而有隨時與家人、朋友分開和搬遷的可能性, 離家、轉學或脫離原有的社會支持和穩定的系統是這些孩子常經歷的生活事件, 躲避施暴者的尋找, 也成了他們常有的生活方式 (Gondolf & Fisher, 1991)。

Straus(1991)以一九八五年全美家庭暴力調查資料, 研究兒童目睹婚姻暴力對問題行為的長期影響後發現: 兒童期具有目睹父母婚姻暴經驗的成人有較多心理健康的問題(較高的焦慮症候群、壓力); 兒童期目睹婚暴的男性較

其他男性有較高的酗酒比率; 且其在後來組成的家庭中, 婚姻關係有較多的口頭及肢體暴力, 其虐待(口頭虐待、肢體虐待)子女的可能性亦較高; 這些男性較其他不具目睹婚暴經驗的男性有二至三倍的家庭外的暴力犯罪行為; 兒童期目睹母親被殴打的女性亦有較高比率的暴力犯罪行為。Straus指出根據這樣的結果, 可以得到一合理的推論: 目睹父母親婚姻暴力的兒童較易有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而此一情形可以推論到各個社經階層的兒童, 且不管兒童本身是否有遭受虐待, 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根據Fantuzzo & Lindquist (1989) 的文獻探討發現, 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可分成五大方面來加以分析(引自曾慶玲, 一九九八: 二七)。

一、外在行為問題: 指這些兒童比較有攻擊性行為。

二、情緒問題: 如消沉、焦慮、沮喪、害怕、失眠、尿床、抽筋、自殺; 其中焦慮是很普遍的現象。

三、社會功能: 社會表現能力(如角色勝

任), 比一般兒童差。

四、智力或學業問題: 上課不專心, 影響課業。

五、身體障礙: 語言發展或認知學習都比一般兒童低。

Barnett等人(1997)則綜合整理相關學者對暴露於婚姻暴力之兒童的影響研究, 將婚暴對兒童的影響分成三大方面: 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學校問題與社會能力、外向性行為問題, 如下表(引自曾慶玲, 一九九八: 三八—三九)。

促使目睹兒童受到父母婚姻暴力影響的因素

婚姻衝突的產生, 是婚姻生活中不易避免的問題, 然而婚姻衝突不必然產生婚姻暴力, 且並不是所有的婚姻衝突均會造成兒童生活適應不良的問題, 也不是所有父母間存在著衝突的兒童, 都會產生臨床上內、外在的問題 (Jouriles, Murphy & O'Leary, 1989); 即使在同一個婚姻暴力家庭中成長的目睹兒童, 也並

父母親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內向性行為和情緒問題

焦慮／暴躁	Holden & Ritchie (1991); Hughes (1988)
低自尊	McKay (1987, 1994); Randolph & Conkle (1993)
害羞	Elbow (1982); Hughes (1988); McKay (1987, 1994)
憂鬱	Hershorn & Rosenbaum (1985)
自殺傾向	Christopoulos et al. (1987); Hershorn & Rosenbaum (1985); O'Keefe (1994a)
退縮	Hershorn & Rosenbaum (1985); Hughes (1986)
創傷／壓力反應	; Koski (1987)
	Hughes (1986)
	Jaffe, Wolfe & Wilson (1990); Rossman et al. (1993)
	; Silvern & Kaersvang (1989); Terr (1991)
失落／生氣／悲傷／錯亂	Alessi & Hearn (1984); Carlson (1984);
	Cassady, Allen, Lyon & McGeehan (1987);
	Jaffe et al. (1990); Layzer, Goodson &
	DeLange (1986)
自責	Ericksen & Henderson (1992); Jaffe et al. (1990)
身體上的問題	Fantuzzo & Lindquist (1989); Keronac,
	Taggart, Lescop & Fortin (1986); Layzer et al.
	(1986); Mertin (1992); Reid, Kavanaugh &
	Baldwin (1987)

學校問題和社會能力

學校問題	Hilberman & Munson (1978); Layzer et al. (1986)
	Pfouts, Schopler & Henley (1982);
	Westra & Martin (1981); Wildin, Williamson,
	& Wilson (1991)
社會能力	Hughes (1988); Layzer et al. (1986); Rossman
	et al. (1993); Wolfe, Zak, Wilson & Jaffe (1986)
缺乏同情心	Hinchey & Gavelek (1982); M. S. Rosenberg (1987)
低問題解決能力，非暴力解決方式，	Grossier (1986); Jaffe et al. (1990); Moore,
	Pepler, Mae & Kates (1989); M. S. Rosenberg (1987)
衝突解決技巧	Straus, Gelles & Steinmetz (1980)
接受／適應	Hanson, Sawyer, Hilton & Davis (1992); Jaffe et al.
	(1990); Ulbrich & Huber (1981)
低認知能力	Hart & Bressard (1990); Westra & Martin 1981

外向性行為問題

攻擊	Holden & Ritchie (1991); O'Keefe (1994);
	Randolf & Conkle (1993); Rutter & Giller
	(1983); Sternberg et al. (1993); Straus et al.
	(1980); Westra & Martin (1981)
酒精／藥物濫用	Dembo, Williams, Wothke, Schmeidler &
	Brown (1992); Fantuzzo & Lindquist (1989);
	Keronac et al. (1986); Layzer et al. (1986)

資料來源：Banett et al., 1997, 引自曾慶玲, 1998, p38-39

不是每一位目睹者都會受到相同的影響 (Rosenberg & Giberson, 1991)。因此，爲了解促使婚姻暴力目睹兒童受到不同影響的因素，本文綜合了各項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性別：目睹原生家庭暴力行爲的兒童，在處理衝突時，會表現暴力攻擊的行爲或被動的接受暴力的傾向 (Tuity & Wagar, 1994)，而許多研究結果也支持受到嚴厲身體懲罰的孩子，將來也會用相似的管教策略來對待他的子女 (Simons, Wu, Johnson & Conger, 1995)。

一般來說，男童特別容易表現出攻擊的行爲，而女童則較常處在懷疑和不信任的情緒中 (Gondolf & Fisher, 1991)。男童有較明顯的外向性行爲 (破壞或攻性行爲)，女童則有較多的內向性行爲 (身體不適、退縮、依附和依賴) (胡美齡，一九九八；夏以玲，一九九九)；由於不同的性別 (sex) 內化不同的性別角色 (gender role)，而獨斷和攻擊是男性解決衝突時可以接受的行爲策略，因此經驗到兒童虐待和在原生家庭中目睹父母婚姻暴力的男性，較會遵行他在兒童時期學習到的角色模式，在面

突時攻擊他的配偶；但同樣的經驗對女性而言，則較容忍這種虐待行爲，並會合理的認爲這是婚姻生活中的常態，和可預期的行爲 (Anson & Sagy, 1995; Rosenbaum & O'Leary, 1981)。女性早期在原生家庭中的毆打經驗或觀察毆打時的因應模式，很可能影響女性未來被毆時的反應模式 (陳若璋，一九九二)。

二、年齡：Cummings, Zahn-Waxler and Radke-Yarrow (1984) 的研究結果指出，較年幼的兒童在面對父母爭執時多用哭、喊等方式來反應，但較年長的兒童則很容易直接地干預父母的爭執 (引自 Tuity & Wagar, 1994)。而由 Arroyo and Eth (1995) 的研究結果更可以明瞭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常會因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創傷反應。

(一) 嬰兒期：受限於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嬰兒期受到心理創傷的嬰兒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他們的創傷的，不過，仍暴露於創傷事件下的嬰兒，其反應是與暴露於相同壓力下的較大兒童相似的，他們也會出現驚嚇反應、發展上的退化、偏執行爲、做惡夢和身體失調 (dysregulation) 等現象。

(二) 幼童期：三至五歲受創的目睹兒童，可能會出現較多行爲上的問題和一些退縮的逃避症狀，以致於他們可能過度的依賴母親，出現相當強烈的依附現象，而無法單獨進行一些活動和發展社交技巧。此外，三歲後與心理創傷有關的記憶，可能會阻礙兒童左腦的發展，而使得兒童的發展停留在三歲左右的階段。

(三) 學齡兒童：已經養成大小便習慣和適當語言發展的學齡兒童，可能會因爲父母間持續暴力攻擊所形成的壓力，而使得兒童的發展退化到前一階段——大小便無法控制和無法溝通的階段，而此一退化情形較易受到同學的排斥，使其社交行爲的發展受到影響。

(四) 青少年階段：青少年階段所出現的心理創傷，可能使得青少年出現 PTSD 的成人型式，在創傷初期，青少年可能會出現許多反社會的行爲，重演許多威脅生命的事件和行爲。

三、出生序：在出生序的部分，家族治療的學者 Bowen 曾指出在家庭中具有特別的出生序，或出生時正處於家庭面臨不尋常壓力

(特別是對母親來說特殊的壓力)，或與父母的原生家庭中對父母有特殊意義的手足之性別或排行相同者，以及有身體缺陷或對父母爭執的感受性較高者，較容易被拉進父母衝突的三角關係中；雖然Bower認為在家庭系統中，每個小孩的實際出生序可能不同於功能上的出生序，而且其功能上的出生序會比實際上的出生序，更能預測是否會被捲入父母的婚姻衝突裡，但Bower仍指出通常長子(女)以及老么最容易吸收父母的焦慮，而進入三角關係中(胡美齡，一九八)。沈慶鴻(一九九七)的研究則指出，若以排序的條件來看，家中的老大與老二(功能性老大)通常是受父母婚姻暴力影響最大的子女。

四、目睹次數和嚴重程度：Rosenberg & Giberson認為通常目睹次數最多者，所受到的影響最大；Gryth, Jouriles & Swank(2000)及沈慶鴻(一九九七)則均在其研究資料中發現，家中最常目睹父母婚姻暴力衝突者，或目睹衝突所造成的傷害其嚴重程度愈重者，所受到的影響通常也愈大。

五、本身的焦慮經驗：Gryth, Jouriles &

Swank(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若兒童本身為父母暴力的目睹者，亦為暴力衝突中的受害者，其生活適應的嚴重度超過只經歷單一類型(目睹或經驗)者，沈慶鴻(二〇〇〇b)的研究發現亦證實手足中常遭父母(尤其是父親)體罰者，其生活適應的概況較其他的手足差。

六、親子關係：Howes及Markman(1989)曾提出在父母的婚姻衝突中，若父母有良好的婚姻衝突之解決能力及溝通技巧，將會增進兒童的幸福感受；亦即父母的婚姻衝突雖會對兒童產生不良的影響，但是，父母若能有較佳的衝突解決能力時，則其衝突對兒童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減低(趙小玲，一九九八)；賈紅鸞(一九九一)以Bower的理論為架構，探討自我分化對兒童的影響時發現，涉入父母三角關係者的適應情形較差，王鬱雷(一九九四)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與父母、同儕以及重要他人的關係愈親密，愈少涉入三角關係，以及維持愈多的個別化關係者，其所感受到情境或特質焦慮的情況則愈少(引自張虹雯，一九九九)。

Gryth, Jouriles & Swank(2000)亦發現現在父母暴力衝突期間，若親子間有較佳的親子關

係，將會降低暴力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的可能性；父母間的暴力衝突現象，亦會影響雙親與兒童間的親子關係；由於多數的婚暴家庭是以父親攻擊母親的情形為多、也較嚴重，且父親多半在親子關係中屬於較少參與的一方，因此在婚暴發生後，母親很容易成為兒童主要的依附對象，且在Gryth, Jouriles & Swank研究的樣本中有超過半數的母親的配偶是繼父，因此，母親與兒童間的依附關係、父親與兒童間的疏離現象也就更加明顯了。

七、對衝突的知覺與評估能力：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評估能力，影響兒童對父母衝突的當下反應，也影響其日後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劉蓉果(一九九八)以國中生成為樣本的研究結果顯示，當父母衝突為子女所知覺的程度愈高，子女在人際關係上的困擾愈大。江瑞霞(一九九四)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知覺父母衝突愈高的兒童，其社會適應(包括與家人關係、在學校與同儕、老師的關係、反社會行為、利他行為等)亦愈差。林美娟(一九九八)以兒童在學校的生活適應為指標，也發現知覺父母衝突愈高的兒童其學校生活(包括與同儕、老師

的人際相處上)適應愈不好。

Gryth, Jouriles & Swank (2000) 的研究發現亦支持兒童對暴力行為的知覺和評估與兒童的適應有關，且對暴力威脅和責備的評估能力，比目睹暴力的次數、嚴重度等的因素具有更好的區辨度；此外，在 Gryth, Jouriles & Swank 的研究中亦發現，當兒童對暴力的陳述與母親不同時（由於兒童對暴力的知覺和評估影響其適應力），兒童本身對問題的陳述，比母親的陳述，對了解兒童的適應情況上，具有較高的預測力。

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處遇

對目睹兒童處遇有效性的研究和文獻，到目前為止仍是相當缺乏的，雖然許多的庇護所已針對婚暴婦女及目睹兒童發展出部分的工作計畫，但是多數的工作成果都屬於經驗性的工作心得，缺乏系統性的實徵研究。Rosenberg & Rosman (1990) 則在綜合了實務經驗、文獻及研究上的建議後，提出下列處遇上的建議：

一、危機介入策略

(crisi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多數的受虐婦女在離家時，都曾考慮過「究竟應把兒童安置於何處？」這類的問題，當夫妻間的暴力衝突成了公開的事件時，許多的親屬也多半都會捲入暴力衝突的事件中，且不同的親屬間可能常會就婚暴衝突的對、錯而陷入不同的爭論裡，此時若將兒童安置在親屬家，對兒童而言可能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安置方法；機構性的安置較屬於一種中立的安置法。

為了躲避施虐者的攻擊，許多婚暴受虐者會帶著兒童暫時的進入庇護所生活，當兒童隨著母親進入庇護所時，為了協助兒童適應這種突發的危機狀態，工作人員可使用個別會談的方式，以兒童可以接受、熟悉的方式為他們做定向 (orientation) 的服務；許多庇護所運用童話書的型式，設計出符合兒童閱讀的書籍，讓兒童可以透過閱讀的方式，來了解兒童和媽媽住進庇護所的原因、可能會有感覺、庇護所內機構的期待和規則；初期危機介入會談的目標，主要在提供兒童一個立即性的說明、保證兒童與母親的安全、表達對兒童的支持和危機

能夠被處理的期望；這些會談的內容主要包括：(一)將焦點放在創傷事件，協助引發兒童對暴力事件的情緒，(二)透過敘述、遊戲或繪圖的活動，協助兒童在創傷經驗中獲得可以掌控的感覺；而此時如何將相關的家庭成員、學校和其他的福利資源結合在一起，並發展和維持同盟關係，是助人工作者此時重要的工作重點。

二、團體介入策略

(group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團體處遇對婚暴目睹兒童而言，是目前庇護機構內最普遍使用的處遇方式，且多數的專業工作者也認為這是最適合用來協助目睹兒童的工作方法；Alessi & Hearn (1984) 曾針對八~一六歲的兒童提出一個相當好的團體處遇的方案，其主要的目標在於(一)提供兒童在危機階段的支持，(二)幫助兒童辨認和表達情緒，(三)教導兒童問題解決的技巧，(四)幫助兒童學習適當的因應行為；這個團體介入的方式是有時間限制的(六次)、結構的、並強調兒童的優點和潛能的，每次的團體都有一個焦點，並包括特別的練習、討論、分享和家庭作業，而六次團體的主題分別是：(一)辨認和表達情緒，(二)關於

暴力，(三)解決問題的不良方法，(四)解決問題的好方法，(五)性、愛和性別，(六)結束和道別。

Jaffe, Wilson and Wolfe (1986) 亦曾針對目睹嚴重暴力衝突的兒童，提出了十次、每次一、五小時的團體治療方案(八~十歲為一個團體，十一~十三歲為另一個團體)，其團體目標主要為(一)辨識情緒，(二)處理自己的憤怒，(三)預防兒童虐待和教導基本的安全技巧，(四)尋找和使用社會支持，(五)社交能力和自我概念，(六)對暴力責任所引發之情緒上的處理，(七)對家庭的期望、重覆性的分離和對未來不確定感的處理，(八)對男性、女性之性別刻板印象和迷思的處理等；至於團體各次的內容，工作人員則可以依成員的需求不同而做彈性的調整。

三、個別介入策略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危機處理和團體處遇的方案內容，多半也都會成為個別處遇的焦點，特別是針對適當的問題解決技巧的討論：賦權(empower)常是婚暴受虐婦女處遇的一個重點，但對目睹兒童而言，這個部分卻不常被強調：在目睹兒童個別處遇中，較常強調的內容主要是

(一) 針對兒童對婚暴創傷記憶的因應行為：這些孩子在臨床上常出現的症狀與 PTSD 相似，所目睹的這些經驗會干擾他在學校的表現，讓他無法專心，上課時常出現做白日夢的現象，晚上則常被伴隨著哭泣和尖叫的惡夢驚醒。有時候他甚至可以不不停的告訴別人他所告到的一切，有的時候又會出現回憶不起來和拒絕談論任何經驗情形，對他們來說世界是危險的，充滿不可預期的事。

(二) 對人或事覺得有力(power)或無力(powerless)的感覺：有強烈的責任感要使事情變得更好，能夠控制身旁事件發生與否的能力，對這些目睹兒童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他們會希望能挽救或改變一切。然而，當衝突再處發生，而他們卻沒有能力改變現況的時候，沒有能力(incompetent)的感覺會讓他們自己是相當糟糕、無力的(powerless)、自我效能感低的、自我價值感低的，甚至出現一些攻擊和憂鬱的症狀。

(三) 情緒的敏感和情緒表達的困難：多數的目睹兒童會呈現出對媽媽的情緒變化相當的敏感、但卻不願談論自己的感受的現象，會

傾向忽略和否認自己的傷心、憤怒、和害怕的情緒，而不願表達他自己的困擾；不過，不去表達他的情緒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困擾，他們可能會透過生氣和攻擊來表現他們的情緒，並缺乏良好的情緒因應策略。

不論個別處遇中治療者處遇的重點為何，與目睹兒童一起工作，治療者需要考慮兒童的年齡、認知能力、自我發展的程度，因為這些變項將會影響兒童的暴力經驗、因應行為，以及對責任的理解能力，亦將直接、間接的影響治療的效果。

四、家庭介入策略

(famil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以家庭為單位的介入方式，在庇護所內亦是十分普遍被用來對目睹兒童提供服務的方法，只不過參與的家庭成員都只有母親，因此有時也會與團體介入的方式一起併用，在團體的情境中與其他的婦女一起討論兒童的發展概況、增進親子關係和教養技巧、了解兒童的情緒需求、健康醫療上的問題，及婚暴對兒童的影響等。

此外，在一般的情境下(非庇護所的情境)

，工作者若將以家庭介入的方式做為提供婚暴夫妻和子女問題的處理模式時，「案主能否安全的接受治療」的準確性評估，是工作者在決定處遇計畫時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否則這種介入策略將更陷婚暴受虐者或目睹兒童於危險情境中。

結語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目標在保護受虐者、協助施暴者，並預防家庭暴力的發生；因此保護所有因家庭暴力而受傷害的家庭成員，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基本精神，也是家庭暴力防治機構應協助的對象；兒童——尤其是目睹暴力的兒童，則常是家庭暴力議題中，最被忽略的對象。

受限於語言和情緒表達能力上的不足，兒童並不容易將他們所有的恐懼和擔心告知家人，更不會透過社會福利的資源網絡來表達自己的困境；且由於兒童在家中的地位最低、權利最小，也最沒有能力來表達和滿足自己的需求，因此兒童的權益常在成人的忽略下被犧牲

了；然而，這些影響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並不會因為沒有表達而消失的；它們甚至隨著兒童的成長在人際、學習和社會適應上產生干擾，因此，為擔心婚姻暴力對兒童可能造成的短期或長期的影響（暴力的循環），兒童的父母和專業工作人員都應對目睹兒童有更多的關注和了解，並為目睹兒童的不同需求和問題提供更多的服務。

（本文作者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書目：

- 沈慶鴻 一九九七 婚姻暴力代間傳遞之分析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輔導系博士論文。
- 沈慶鴻 二〇〇〇 a 婚姻暴力案主習得的無助感之分析研究 實踐學報 三一五 三—九一頁
- 沈慶鴻 二〇〇〇 b 婚姻暴力對子女手足間生活適應形成差異影響之探索性研究。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婦女議題研究論文發表會
- 林美娟 一九九八 兒童知覺的雙親婚姻衝突歷程對其生活適應影響之歷程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碩士論文
- 胡美齡 一九九八 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主觀知覺期親子關係之分析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以玲 一九九九 家庭暴力對少年暴力犯罪行為之影響 私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若璋 一九九二 台灣婚姻暴力策略高危險因子之探討 台大社會學刊 二二—二三—一六〇頁
- 張虹雯 一九九八 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慶玲 一九九八 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問題行為影響研究 國立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小玲 一九九八 國小學童所知覺的家庭暴力與行為問題的關聯之研究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宗幸 一九九九 社會支持、自我效能對兒童覺雙親衝突影響兒童生活適應歷程

之調適效果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碩士論文

劉蓉果 一九九八子女知覺父母衝突對其
適應的影響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

S. (1994). Marital conflict, gender, and
children's appraisals and coping
efficacy as mediators of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8(2), 141-
149.

courts : is McMartin the best we can do.
Social Thought, 17(1), 12-21.
Jouriles, E. N., Murphy, C. M., & O'Leary
K.D. (1989). Interspousal aggression,
marital discord, and child problems.

Arroyo, W. & Eth, S. (1995). Assessment

following violence-witnessing trauma. In

E. Plede., P. G. Jaffe & J. L. Edleson

(Eds.), End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

Community Response to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CA: Sage.

Anson, O. & Sagy, S. (1995). Marital violence:

comparing women in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Unions. Human Relations,

48(3), 285-304

Beckford, P.H. (1994). The Impact of

Witnessing Parental Violence on Adult

Childre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5(06), 2393B.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94-27387)

Cummings, E. M., Davis, P. T., & Simpson, K.

Folstrom-Cohen, B. & Rosenbaum, A. (1985).

The effects of parent marital violence on you-

ng adult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Jour-*

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2), 467-4

72.

Gondolf, E. W. & Fisher, E. R. (1991). Wife Bat-

tering. In R. T. Ammerman & M. Hersen (E-

ds). *Case Studies in Family Violence*. New Y-

ork : Plenum Press.

Goodman, G. S. (1984). The child witness: concl-

us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for research and le-

gal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2)

, 157-175.

Gryth, J. H., Jouriles, E. N., & Swank, P. R. (20-

00). Patterns of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1), 84-94.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453-455.

Peled, E., Jaffe, P. G. & Edleson, J. L. (1995).

Living in violence culture : introduction.

In E. Plede, P. G. Jaffe & J. L. Edleson

(Eds.), End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Community Response to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CA: Sage.

Rabinowitz, H. J. (1985). The child as an

eyewitness : an overview. *Social Action*

and the Law, 11(1), 5-10.

Randolph, M. K. & Conkle, L. K. (1993).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ho witness parental

violence. *Family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Bulletin, 9(2), 23-27.

Rosenbaum, A. & O'Leary, K.D. (1981).

- dren : the unintended victims of marital viol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1(4), 692-699.
- Rosenberg, M. S. & Giberson, R. S. (1991). The Child Witness of Family Violence. In R. T. Ammerman & M. Hersen (Eds); *Case Studies in Family Violen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 Rosenberg, M. S., & Rossman, B. B. R. (1990). The child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In R. T. Ammerman, & M. Hersen. (Eds), *The of Family Violence: A Sourcebook*. Canada :John Wiley & Sons.
- Simons, R. L., Wu, C., Johnson, C. & Conger, R. D. (1995). A test of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Criminology*, 33(1), 141-171.
- Straus, M. A. (1991). Children as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a risk factor for life long problems among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American men and wome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6713).
- Tutty, L. M. & Wagar, J. (1994). The evolution of a group for young children who have witnessed family violence.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7(1/2), 89-104.
- Ulbrich, P. & Huber, J. (1979). The effect of observing parental violence on gender-role attitude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83468).
- Webersinn, A. L., Hollinger, C. L. & Delamatre, J. E. (1991). Break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relevant to treatment follow-through. *Psychological Reports*, 68, 231-240.
- Weissman, H. N. (1991). Forensic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ild witness in cases of alleged sexual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1(1), 48-58.
- Worth, D. M., Matthews, P. A. & Coleman, W. R. (1990). Sex role, group affiliat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courtship violence in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1, 250-254.